

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党组织 在哈尔滨的主要活动及其历史贡献

何伟志

哈尔滨是一座承载着光荣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血脉的英雄城市。翻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哈尔滨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无不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洒下的鲜血和留下的足迹。

斗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史页，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经历这一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变后，哈尔滨和全国一样，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东北地区工人运动的开展和在东北建党的工作，先后派马骏、罗章龙、陈为人、李震瀛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哈尔滨进行革命活动。1921年11月，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派地委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赴东北考察工运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罗章龙对整个东北地区的工人阶级状况和工人运动情况有了较为全面、具体的了解。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共北京地委提交了《关于东北工人运动状况和建议在东北建立党组织和工会的报告》。对此，中共北京地委非常重视，在北京沙滩红楼听取了罗章龙考察的详细汇报。罗章龙向中共北京地委建议，派专人到哈尔滨开展革命活动和筹建党组织。

1923年3月，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根据罗章龙和共产国际的提议，决定派负责北方铁路总工会工作的陈为人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前往哈尔滨开展建党工作。陈为人、李震瀛到哈尔滨后，即深入社会进行调查，发现《哈尔滨晨光报》“独树一帜、标新立异”，文字又通俗易懂，是一份进步的报纸。陈为人、李震瀛决定登门拜访《哈尔滨晨光报》主人韩连声。他们与韩连声接触后，一见如故，当即表示愿为报社义务工作。此后，陈为人、李震瀛即以《哈尔滨晨光报》记者的身份公开身份，广泛接触社会各界，积极进行革命宣传等活动。陈为人、李震瀛还创办了“哈尔滨通讯社”和“哈尔滨青年学院”，开展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宣传教育，为建立党团组织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陈为人、李震瀛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注重培

养党团积极分子，相继在进步青年中发展了5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成立。1923年8月以后，中共北京区执委又先后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彭守朴和中共党员陈作霖到哈尔滨协助陈为人、李震瀛筹建党团组织工作。此时，哈尔滨有党团员9人。其中，党员3人，团员6人。1923年10月，成立中共哈尔滨组（亦称中共哈尔滨独立组），陈为人负责，这是东北地区最早成立的中共组织。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直属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区委书记。为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吴丽实到哈尔滨从事党的工作。同年11月，吴丽实到哈尔滨后，首先整顿了党团组织，1925年末，建立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吴丽实任书记。根据中共四大确定的“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吴丽实与中共党员姜文洲、刘湘益等人打入铁路机务段和中东铁路总工厂开展革命活动。经过吴丽实等人细致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很快在三十六棚成立了“中东铁路青年协进会”，并在工人中先后发展9名党员，1926年1月，成立黑龙江地区第一个工人党支部——中东铁路

工人党支部，吴丽实任书记。

1926年4月，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吴丽实在马家沟比乐街召开特支扩大会议，改组哈尔滨特支，成立中共北满地委（亦称哈尔滨地委），吴丽实任地委书记。中共北满地委成立后，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春至1927年9月期间，中共北满地委建立和领导下的党组织包括：哈尔滨市内的三十六棚、地包、学生、警察、皮鞋等6个支部，外市县的安达、双城、牡丹江、长春、吉林等支部，此外在中东路沿线各站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昂昂溪、穆棱、横道河子、绥芬河等均有党的小组或党员活动。同时奉天、柳河、台安等许多地方党组织也纷纷建立。在中共北满地委的领导下，以哈尔滨为源头，成立了绥芬河、横道河子、牡丹江、双城、安达党支部。呈现了以中共哈尔滨党组织为中心向东北地区辐射的趋势。

中共哈尔滨组，犹如撒在东北大地上的一颗革命火种，以燎原之势迅速燃遍东北大地，为哈尔滨也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共哈尔滨组的成立，标志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进入了一个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阶段，为灾难深重的哈尔滨人民和东北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1927年10月，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道里区中国十三道街48号召开。会议听取了陈为人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报告；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等纲领性文件；建立了第一届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陈为人被选为省临时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在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哈尔滨、长春、吉林、大连、奉天等东北党的组织相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东北党员代表大会，大会正式决定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改为中共满洲省委。1931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机关从沈阳迁到哈尔滨，哈尔滨成为东北地区开展反日斗争的指挥中心，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哈尔滨，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一方面加强对各地抗日义勇军的领导，一方面创建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此间，党的“武装抗日、保卫家乡、保卫东北”的号召在哈尔滨各阶层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1932年1月，哈尔滨保卫战爆发。中共满洲省委号召士兵和群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各级党组织奔走于工厂、学校及呼海路沿线，发动工人、农民、学生支援抗日军队。哈尔滨保卫战及周边五常、依兰、宾县、珍珠、木兰、方正、延寿等县的义勇军，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自1932年春开始，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出党团员干部，赴东北各地独立创建抗日游击队。曾在哈尔滨工作或学习过的杨靖宇、赵尚志、魏拯民、李兆麟、金伯阳、许亨植、夏云杰、周保中、冯仲云等受党派遣，陆续奔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斗争最前线，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在哈尔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要比国内其他地区早得多。马列主义在哈尔滨传播之始，可追溯到中东铁路修建时期。1905年11月，在哈尔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团建立。该组织活动的主要基地就在中俄工人共同作业的中东铁路哈尔滨临时总工厂。俄国社会民主党哈尔滨工人团负责人舒米雅茨基（当时化名“西林”），以车工（当时称“盘旋工”）的身份作掩护，在中国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在哈尔滨的传播势头，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大批旅俄华工回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及早期共产党人的有序宣传，尤其是共产国际“东方路线”的施行，进而达到高峰。受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邓洁民在哈尔滨创办东华学校，宣传新思想，倡导社会主义，成为在哈尔滨传播马列主义的先行者。

中东铁路的建成，使中国铁路与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相通，成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重要交通要道。这条道路与中国革命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一条通往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红色之路”。哈尔滨是这条红色之路的中枢，中转，成为必经之地。

1919年“五四运动”后，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频繁同中国的革命力量接触，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并迅速建立密切联系，帮助中国建党。鉴于情报和交通联络的需要，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哈尔滨建立了国际交通局。在哈尔滨及满洲里、扎赉诺尔、密山等国境线地区续建了5个交通站和联络处。这对加强东北地区党组织与党

点燃燎原“星火”

——引领东北地区党团组织建设，把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新阶段

吹响抗日“号角”

——引领东北人民开展反日斗争，哈尔滨成为东北抗战的“总指挥部”

追寻革命“真理”

——引领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构建和巩固了通往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红色之路”

北人民革命军等各部队相继接到《八一宣言》，使战斗在抗日斗争第一线的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1936年2月，以杨靖宇、赵尚志、李延禄、王德泰、周保中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将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军、反日游击队一律改成东北抗日联军。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展党所领导的抗日部队，根据《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要求，从1935年冬到1936年8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到1937年11月，又先后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八、九、十、十一军。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名称不同、建制不同的抗日武装，相继改编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

在东北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中共满洲省委以扩大城乡人民的反日运动进行武装斗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创建抗日武装，开辟红色根据地，使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抗击日伪军的重要力量。哈尔滨作为东北抗战“总指挥部”所在地，为东北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从1921年11月至1924年5月间，路经哈尔滨去苏俄的中国共产党人有30多人。其中包括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高君宇、邓培、林育南、夏曦等；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第五次和第二次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的陈独秀、刘仁静、王俊、李大钊、王荷波、彭述之和刘清扬等。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来去都在哈尔滨停留，住在堂兄李祥年的同乡王芳田在哈尔滨道外开设的宏昌茂杂货铺里。李大钊还向王芳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人民经济建设情况，并断言中国革命非走俄国人的路不可。

中共六大是在极其秘密、严峻的条件下，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代表大会。中共六大代表能够安全赴苏，哈尔滨地下党的秘密护送功不可没。在哈尔滨秘密接待站参与护送中共六大的阮节庵后来回忆说：“在这以后的一天，李纪渊到我家，总结了这段护送中共六大代表的工作情况后说，这些日子大家都很辛苦，可是作为中共哈尔滨地方组织，我们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为中共六大的召开作出了贡献。”

筹备协商“建国”

——引领探索协商民主新路，亲历和见证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共商国是的重大历史进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布《中共中央纪念“五一节”口号》（以下简称“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此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1948年5月，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发布前后的多封信电中，都确定在哈尔滨筹备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士，从全国各地和国外突破重重封锁，陆续到达解放区。1948年9月13日，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乘苏联“波尔塔瓦号”从香港出发，9月27日上午到达朝鲜罗津港，登岸稍事休息后即换乘火车，于9月29日抵达哈尔滨。9月29日，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委谭平山，农工民主党执委会主席章伯钧、原国民党军19路军军长蔡廷锴等民主人士，突破重重困难，一路辗转，来到哈尔滨。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到达哈尔滨，即与先后到哈的民主人士会合，使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面对面协商新政协成为可能。

哈尔滨的马迭尔宾馆见证了人民政协全新启航的历史时刻。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指挥下，东北局主要领导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代表的讨论协商于1948年10月下旬正式开始。地点在马迭尔宾馆二楼会议室。正式会议进行了三次，当时称之为新政协筹备会的重大历史进程。

倾力支援“前线”

——引领做好战争胜利保障工作，为东北和全国解放作出重要贡献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由此开启了哈尔滨城市历史的新篇章。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哈尔滨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承担了繁重的支前任务。

1946年底，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全面爆发。到1947年，解放战争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此时，解放全东北的条件逐渐成熟，但在武器装备上我军却比国民党差得多。为提高人民军队的作战能力，在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条件下，哈尔滨市充分利用原有的条件组织军工生产。据统计，“1946年至1948年全市机械行业职工共生产六〇迫击炮2337门、六〇炮弹25万发、六〇炮宣传弹2000枚，掷弹筒261个，掷弹筒弹4万发，八二迫击炮弹2万发，爆破筒1.5万支，信号枪2276支，土坦克18辆，马刀1万把”。1947年6月4日，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钟子云在市委系统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前方有90万军队在打仗，需要大量的军需生产、人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集中一切力量支援解放战争，是市委今年的具体任务之一”。为了完成大量的军需任务，哈尔滨市工商局与东北军需部建立了经常的协同关系，共同组织完成各种军用被服、鞋帽等加工任务。仅1947年和1948年两年，哈尔滨市共生产单军服67.4万套；棉军服54.9万套、棉皮帽76.1万顶、棉大衣46.8万件、棉手套61万副、棉袜子11.2万双、棉皮鞋6.1万双、棉被1万条；夹皮鞋3.3万双；胶鞋59.7万双。1949年1月至2月还完成生产单军衣40万套。

1947年，国民党在全国战场受挫后，大要“关门停战、关外大打”的阴谋。为了向前线补充兵力，中共哈尔滨市委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指示精神设立了扩军委员会，通过基层政权和工会、民青、妇联、农会等群众团体召开大会，向群众广泛宣传参军参战的重要意义。哈尔滨市以全国解放大局为重，积极筹建各级各类学校培训干部，使之成为中央选派南下干部的主要来源。从哈市派出的南下干部在配合军事斗争、巩固革命阵地、创建地方新政权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以及东北局的领导下，哈尔滨人民响应党的“一切为了支援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号召，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各类支前工作，做到了“要钱给钱，要物出物，要人有人”，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城市历史文化专家组组长）